

从“文化焦虑”走向“文化自信”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价值指引

卢德友¹, 王黎²

(1.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4; 2. 南京晓庄学院图书馆, 江苏 南京, 211171)

摘要:马克思对“精神生产”进行的基本规定,直指现代社会的精神构建,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科学的价值指引。中国现代化建设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以来文化的“焦虑”状态,并重新激活文化自信的理论话语,引领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主要方向。新时代的精神生产,旨在讲好“中国故事”、凝聚“中国精神”,贡献“中国智慧”,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坚定和展示强大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马克思;精神生产;文化焦虑;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A811

精神生产在唯物史观的范畴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其与“物质生产”相对,因而在当前研究中受关注程度相对不足。长期以来,学界致力于阐发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有意无意地忽略精神生产的现实价值。殊不知,我们当下对于文化自信的谈论与坚持,离不开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这一重要思想资源。正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改革与建设取得的成就,从根本上推动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从“文化焦虑”到“文化自信”的心理转变。在新时代,我们如何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进而如何通过富有特色的精神生产去牢牢坚守文化自信,不仅事关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也关乎“中国道路”所应展示的文化效应。

一、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及其文化意蕴

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在创建和完善唯物史观过程中,也全面探讨了精神生产主体、内容、特征及其与物质生产的辩证关系,以此形成关于精神生产的完整理论图景。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基本形式,精神生产是与物质生产相对应的重要领域,它直接指向“关于意识的生

产”。可以说,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认识,为我们坚守文化自信提供了科学的价值指引。

(一) 马克思“精神生产”的理论意涵

在批判以“思维内在性”为特征的德国古典哲学过程中,马克思对“精神生产”抱以极大关注。事实上,马克思的诸多文本都曾论及“精神生产”,并且对其认识呈现出逐步深入的过程。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首次使用“精神生产”概念来探讨社会意识领域的活动,指出“精神劳动产品”的价值度量依然是劳动时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则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直接论述精神生产,指出“政治、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的生产”乃是精神生产的主要内容。之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又对此进行重要补充,强调“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1]。关于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做出深入阐发,明确要考虑物质生产特殊的历史形式,否则“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2]。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活动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精神生产亦是如此。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历史阶段,原始的宗教仪式、艺术创作、自然求知等与物质生产相联系的活动,构成精神生产的最初发端,但它此时尚未成为一个专门

收稿日期:2022-08-20;修回日期:2022-10-18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逻辑研究”(30919013301);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建设)基地“政治建设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卢德友,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E-mail: ludeyouhl@163.com

引文格式:卢德友,王黎.从“文化焦虑”走向“文化自信”——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价值指引[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1):1-6.

的生产领域。直到社会分工的深入推进,科学、宗教、哲学、艺术等文化生活的发展推动脑力劳动者队伍壮大,精神生产才成为相对独立的专门领域。据此,马克思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成为真正分工。”^{[3]82} 总体而言,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规定了如下几个内容范畴。

其一,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辩证统一。在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精神需求,精神生产作为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由此产生。在人以对象化活动来确证本质的生产实践中,精神生产凝结和体现人的精神力量。也即是说,物质生产是基础,它“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当然也决定了精神生产的性质。然而,物质生产并不能直接创造精神产品,更不能代替人们对生产精神产品做出的价值选择。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后者转化并形成精神文化产品。它不仅为物质生产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还满足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进而从精神的维度将人的自由本质体现出来。可以说,两种生产共同构成社会生产的基本方式,是维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根本。

其二,精神生产的核心是思想观念与社会意识。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构建的社会交往关系,通过语言的中介造就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4] 人们精神需求的形式多样,决定精神生产也呈现出复杂内容。无论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抑或是非意识形态的生产,要么以政治、法律、道德的形式凝聚社会共识,通过实现思想认同来维护社会秩序;要么以科学、艺术、文学等形式进行自由创造,开拓人类精神家园以丰富文化生活。当然,这些思想观念与社会意识难免被打上阶级烙印,在社会各阶级所进行的精神生产中,都重视推行反映本阶级的核心价值观。

其三,“现实的人”是精神生产的主体。与物质生产一样,精神生产的承担者是活生生的、感性的“现实的人”,而非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自我演化的“抽象的人”,亦非费尔巴哈那里离群索居的“直观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3]30} 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物质生产旨在摆脱外在的必然规定,而精神生产则是朝向本质的自由自觉。动物的活动旨在解决生存问题与繁衍后代,因而表现为片面的生产;人在此基础上进行“真正的精神生产”,并以精神生产确证自身的自由本质,从而使人

成其为人。当然,自由的精神生产受制于生产力及其基础上的一定交往方式,即受到一定时期的历史条件限制。尽管如此,人的精神生产依然可以能动地自主展开。

其四,自由创造是精神生产的主要特征。纵然精神生产总是被打上阶级印迹,反映出一定的阶级利益和诉求,但不可否认的是,精神生产最重要的特征乃是自由创造。在马克思看来,科学艺术等一系列精神生产都是“自由的活动”。现实的人在创造自我、实现自我的活动中,结合主观兴趣与客观规律对世界进行自由探索,这并非意味着漫无边际的主观臆想,而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的能动创造。精神生产虽然可以打开巨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空间,但它作为人们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客观上不会超出一定的社会结构范畴和生产力水平。同时,物质的经济活动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以追求商品的价值实现和效用体现;较之而言,以精神生产为主的精神活动则遵循自由创造原则,以印证人的存在方式和精神属性。正是人们对精神活动的追求,才建构出人们生活的意义世界,而“人的意义照亮了人的存在”^[5]。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创而来的现代社会,资本和新形而上学共同拱卫着它的现代性特征。资本在无限复制和扩张自身的本能作用下,强势推动其拥有者和追逐者四处奔走,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得以运转的中心,也客观上成就了现代社会高度的物质文明。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盈的背后,是人们精神世界的荒漠化。受到“生产—消费”与“资本—权力”网络的步步围攻,人不断地找寻逝去的精神家园,进而反思自身在“伟大存在之链”上的意义。在资本统治引发精神虚无的情势下,“目的的晦暗”“意义的丧失”以及“自由的牢笼”亦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心理,难怪查尔斯·泰勒会对现代性表示出极大“隐忧”。人的自由精神在现代社会受到束缚而逐渐丧失感性存在,就连艺术品都失去本该具有的“灵韵”(本雅明)。资本统治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将在物质生产达到一定程度时终结自身;而精神状况事关整个社会文化,则需要积极的精神生产加以引导塑造。这样一来,人在现代社会的自由精神生产,要在抵御现代性观念宰制的同时创造出顺应历史潮流的文化。

(二)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文化意蕴

文化即是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中的对象化存在,其中精神成果特别是内在的价值理念最为根本与持久。文化作为一种生产力,整合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对物质生产和

精神生产具有强烈的带动效应,也为社会繁荣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撑。

文化自信的本质是社会价值观的自信,这是一切自信的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当下坚持的“文化自信”与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诸多创见高度契合,并以此展示出浓郁的文化意蕴。一是积极进行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种形式的精神文化产品,无论是生产还是传播,理当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二是精神文化生产的核心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旨在充分张扬人的自由本质。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只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先进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才能普遍提高全体人民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身心健康等素质,最终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是精神文化是否“自信”,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处境息息相关。文化自信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文化自信则民族自信,文化兴盛则国运兴盛。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汤姆·洛克曼所言:“马克思首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全部现代社会生活的可信的框架。”^[6]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要通过精神生产得以确证和延续,而精神生产只能依循现实的发展道路来获得定向。既然精神生产的主要内容是意识形态的生产,那么它在我们的社会条件下就表现为生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个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因为我们重新找回文化的“自信”心态曾经历长期的历史过程。从近代以来民族危局引发的“文化焦虑”,到今天笃定坚持包括文化自信在内的“四个自信”,表征中国人民重塑自身民族价值的艰难探索。因此,我们从文化“焦虑”到“自信”的历史切换,不仅鲜明地意味着民族境遇发生的历史转变,也强烈地吁求精神生产所应有的价值取向。

二、从“文化焦虑”到“文化自信”的精神生产吁求

我国的现代化道路在曲折探索中逐渐走向纵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坚定“四个自信”已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共识与行动自觉。其中,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奠定了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价值导向性。从历史维度观之,中国古代长期保持文化的领先地位,一度造就了中国人民在文化

上与生俱来的强烈自信,但在近代中国遭受外来文化强烈冲击的历史遭遇下,文化上的挫败感与迷茫感一度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以至于当下我们要重新激活文化自信这一曾经不证自明的话语。

自雅斯贝尔斯指称的“轴心时代”以来,中国雄踞东亚两千多年,以“天朝上国”的姿态接受万邦来贺。相应地,中国人民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保持高度自信。然而,鸦片战争之后,这一形势逐渐发生根本逆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天朝上国”迷梦终结破碎,转而生发一种关乎整个民族命运的“焦虑”意识和困惑心理:昔日强盛辉煌的中国,缘何今日落到被动挨打之悲惨境地?在军事与政治相继失守的情况下,文化也遭遇失落的重大危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加之封建统治的摇摇欲坠,促使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产生质疑甚至拒斥。随着西方价值观念的入侵,传统文化难以担当救亡图存之重任,这些知识分子对于本土传统文化的自卑感、危机感与日俱增。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前,这种焦虑心理貌似幽灵般如影随形,以至于出现梁启超、李约瑟、黄炎培发人深省的“世纪三问”。中国人民曾经散发的那种“华夏至上”的“优越情结”^[7],在近代以来的历史遭遇和文化碰撞中变成“文化焦虑”,反映了中国人民对自身精神根基与文化底气的找寻。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夹杂着认知上的偏差,从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改造”,到“文革”期间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毁坏,再到后来对自身文化进行的反思与重建,无不反映出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坚守不够。面对西方以理性构造的强势文化基因,中国知识分子准备不足而仓促应对,以至于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试图割裂文化精神的连续性。一直以来,得益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引领和率先实现,西方文化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地位似乎成为一种思维定式,或多或少地在异域文化中受到认同。然而,我们不能就此妄自菲薄,中国文化以强大的包容性和鲜明的民族性正在受到关注,从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汉语热”“春节热”就可管窥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中国追赶现代性的历程中,文化焦虑又以其他形式显现出来:要么以西方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为基础,启蒙和教化民众的主体意识;要么以传统文化资源拒斥“全盘西化”,以诊治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抑或是立足后现代的批判精神,直接“解构”或是“消解”主体。因此,一种难以抉择和无所适从之感油然而生——既想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质,又对作为“他者”的异域文化心存好奇,并生发出对于自身文化的矛盾心理。究其原

因,中国开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时代错位”的尴尬境地,即尚未完全摆脱传统社会的印迹,却又遭遇后现代的冲击,导致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精神状况并存。因此,在中国精神文化家园的图景里,呈现出中西文化的相互冲突碰撞。

这种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交错并存的尴尬处境,连同人们多元化的精神状况,使得文化自信的坚守难免受到挑战。尽管“四个自信”是当代中国发展现实下必然的时代言说,但思想文化领域的杂音、噪音仍此起彼伏,并随着西方价值观念裹挟而来。具体而言,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西方的价值观念被某些人奉若圭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乌托邦论”从未停歇。在面对时代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巨大解释空间尚未完全展开,以至于连特里·伊格尔顿也难免发生误判:“让马克思主义者失去信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制度仍按照以前的方式运行,并没有进行任何改进。”^[8]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对待资本主义方面我们从未“失去信心”,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在日常观念领域,资本化、世俗化、功利化等观念伴随市场经济而来,优秀的传统文化、优良家风难以抵挡而呈现式微。追捧西方节日、青睐西方商品、推崇西方学术等,被一些人视为时髦之举,而对自身优秀的文化基因视而不见,更没有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9]。思想观念的变化也诱发生活方式的转变。追求享乐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导致“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逐渐兴起。西方的时尚、品牌、娱乐文化成为可以直观感受的符号,因而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竞相追逐,附着其上的拜金主义和“自由民主”等杂质,也随着这些文化符号渗透进人们的价值观念。

此种情势,急切呼唤我们进行旨在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生产。然而,我们对于自身文化的信心如何重建,或者说我们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毋庸置疑,只能来自现实的发展状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取得的成就,成为我们精神挺立和文化自信的基石。马克思曾指出:“只有精神生活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10]文化自信需要我们保持自由的精神和人格,但自由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它作为一种“定在”,“既不存在于无规定性中,也不存在于规定性中,自由同时是它们两者。”^[11]旨在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精神之先声,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2]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革命、改革与建设事业取得的成就,使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得以重新构建。中国共产党确立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又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自苏东剧变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不绝于耳,中国人民既以“思想武器”加以理论反驳,又以自身不断展开的伟大实践有力回应各种错误论调。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努力,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具有了充沛的物质基础与强大的精神基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底的“固本效应”、中国革命文化为中坚的“聚合效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顶端的“引领效应”,构建起中国精神文化的“塔式结构”。伴随着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是新时代中国人民在文化上的觉醒,并逐步开启“生命与文化发展上的觉醒”“社会与道德价值上的觉醒”^[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成就,重新激活和开启中国人民对于文化的强大自信,进一步塑造我们追求民族复兴的文化心理。新的历史境遇下,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以及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策略,“中国道路”所彰显的文化使命,要求我们通过积极的精神生产来坚定并守护文化自信。

三、面向文化自信的当代精神生产

文化自信的重塑须臾不能离开社会整体进步的重大现实,而坚定文化自信更需要精神生产的持续进行。顺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铺开的美好愿景,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应该朝向坚定文化自信而展开,更有力地讲好“中国故事”、凝聚“中国精神”、贡献“中国智慧”,在彰显时代发展新风貌中书写民族复兴新史诗。

“文化特色的发扬,离不开强盛的国力。”^[14]当中国作为新兴的民族国家重回世界舞台,并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时,具有几千年历史积累的文化价值也开始迸发力量。中国依靠自身实践经验凝聚成的“中国道路”,为解决当前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一种作为“他者”的中国经验。然而,文化自信既非简单的社会心理塑造,也非一厢情愿的自我肯定,而是要面对全球文化冲突尤其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并在其中展示自身的民族价值和世界意义。遗憾的是,西方世界以“中心”自居的思维惯性遭遇中国崛起的重大事实,依然无法转换叙事范式,致使中国的和平崛起被视为“中国威胁”,并以此引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错误认知。

精神生产要着眼于文化自信,并最终塑造文化自信,这是我们从西方引领全球化过程中得到的启示。在资本全球扩张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占据世界文化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也奠定其在全球

文化输出的主导地位。图书、影视、音乐等文化形式以及节日、时尚、娱乐等文化符号,都成为西方文化渗透的普遍形态。譬如,美国除了凭借“美元、美军、美剧”的强大攻势软硬兼施地向世界输出意识形态之外,还针对性地采取“文化跟着贸易走”的策略,不断地挤占多元化的世界文化空间。可见,文化在一国的对外战略中确实担当开路先锋,无怪乎亨廷顿会坦言:“西方文化最成功的主角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富有使命感的民主主义者或多国公司的经理人员。他们是而且很可能继续是基督教的传教士。”^[15]约瑟夫·奈甚至还从外交战略的角度赋予文化以“软实力”的功能,声称这种“软实力”就来自于“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16]。这一概念进入精神文化领域后就成为同时表征内部凝聚力与国际吸引力的“文化软实力”,被作为内生自信与国际认同的基本尺度。中国长期以来专注自身的经济建设,在世界思想文化碰撞中并不强势张扬。对此,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任期间被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一个只出口电视机而不是电视剧的中国不足为惧。事实上,中国只是无意向世界输出意识形态,但绝非意味着中国没有精神文化生产。诚然,撒切尔夫人的话也值得我们警醒,即重视自身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传播。

当代中国以伟大实践推动社会的巨大变革,根本扭转近代以来人们在文化上的焦虑心理而走向“四个自信”。鉴于中国人民对社会变革的亲眼见证和深刻体悟,“四个自信”在对内凝聚力方面已成为共识,但在对外吸引力方面仍需实现更大突破。首先,中国开展现代化建设所依据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的道路不可复制。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令同样身负现代化发展重任的亚非拉国家备感兴趣,但国情差异决定了他们无法完全照搬也无必要套用中国模式。其次,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以及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仍有待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发展的解释力,回应多元社会思潮尤其是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质疑,是我们坚持理论自信所要面对的现实拷问和思想场景。再次,受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西方模式而言是一种“异质性”建构,显然有别于西方经典制度的模式常为人所误解。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想要被世界普遍理解和认同并非易事。较之而言,文化领域的对外吸引力可能率先取得突破。拥有几千年底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散发魅力,成为世界认知中国的重要窗口。同时,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在强烈塑造当代中

国人的精神风貌。据此,文化自信在坚定“四个自信”中具有特殊意义,也客观决定我们要进行与之相应的精神生产。

那么,朝向文化自信的精神生产该如何进行?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对于文化自信所给出的启示,为我们当下进行精神生产拟定三个基本原则。

其一,精神生产应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讲好“中国故事”。新中国诞生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对自身的文化也从“焦虑”走向“自信”。社会历史发生的巨大变革,是我们坚持“四个自信”的基础,无疑也是精神生产的现实源泉。马克思的精神生产,是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精神力量体现,并与物质生产达到历史性的统一。对此,精神生产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并在其中讲好“中国故事”。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的根本价值认同上厚植时代元素,为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筑牢思想基础,以根本的价值认同坚定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坚持作为“根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巩固作为“支柱”的红色革命文化,形塑作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三种文化形态有机统一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建设文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7]文化自觉与自信,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只有在不断促进文化繁荣中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其二,精神生产应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凝聚“中国精神”。依据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分析,精神生产的重要目标是要促进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化是精神生产的重要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也肩负着促进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使命。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需求。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我国的文化建设要充分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将人民的价值取向作为精神生产的价值取向。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是对社会发展进步最鲜明的诠释。因此,只有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人民至上”,才能凝聚起强大的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精神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中国追求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呈现出高度的民族凝聚力、自觉的组织动员力、强大的社会感召力的新气象,成为

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展示。

其三,精神生产应敞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视野,贡献“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全人类利益相关与命运相连的立场,表达一种旨在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体意识,所传递的正是—种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发展共享的理念。在微观领域,它聚焦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以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克服现代性的焦虑,表达出旨在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体意识;在中观领域,它倡导建立合作共赢、同舟共济的共同体机制,有助于化解现代社会的矛盾冲突,切中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脉搏;在宏观领域,它秉持全球视野的整体思维,在全球化和世界历史进程中守护人类共同利益,体现具有时代担当的大国情怀。中国独特的民族复兴之路,不仅以合作共赢的方式破除“强国必霸”的陈旧定律,还以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为出发点,深刻回应在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时期“世界往何处去”的重大时代课题,无疑具有世界情怀的高远立意。这是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与西方的重要差别,对此,马蒂内利的活值得回味:“中国的现代化仍在进行之中,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18]“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作为一种文化理想和价值理念而发挥作用。从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逻辑来看,其切中时代脉搏的彻底性有力地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为文化自信奠定现实基础,而马克思精神生产思想的丰富内涵为文化自信提供理论依据。搞好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增强文化软实力,方能以强大的文化自信展

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风貌。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88.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6.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4.
- [5] 赫舍尔.人是谁[M].陈维政,译.贵阳:贵州出版集团,2009:48.
- [6] 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M].杨学功,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280.
- [7] 金耀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38.
- [8]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李杨,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12.
-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70.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19.
- [1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0.
- [12]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 [13] 成中英.新觉醒时代:论中国文化之再创造[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59.
- [14]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249.
- [15]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44.
- [16] 约瑟夫·奈.软实力[M].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5.
- [1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0-41.
- [18] 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M].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

From “Cultural Anxiety” to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Value Guidance of Marx’s “Spiritual Production” Theory

LU De-you¹, WANG Li²

(1. College of Marxist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2. Library of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211171, China)

Abstract: Marx’s basic provision on “spiritual production” refers directly to the spiritual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ociety, providing scientific value guidance for our self-confidence in culture. The great social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China’s modernization drives have fundamentally reversed the “anxiety” state of culture since modern times, have reactivated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have revealed the main orienta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production. The spiritual production in the new era aims at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encapsulating “Chinese spirit”, contributing “Chinese wisdom”, and showing tremendous cultural confidence in promoting the cour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arx; spiritual production; cultural anxiety; cultural confidence